

浙江湖州街景。

快哉东坡·政治家

“乌台诗案”始末

元丰二年(1079年)七月二十八日,担任签书应天府(南京)判官的苏辙派人快马加鞭赶至湖州,告知哥哥苏轼,朝廷已派出皇甫偁等人前来拘捕,理由是“谤讪朝廷”。此时,距四十二岁的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仅三个月。经长途押解,八月十八日,苏轼来到京城,被投送到御史台监狱接受审问。因为御史台别称“乌台”,苏轼的案子又因为诗歌而起,因此在历史上称为“乌台诗案”。

王安石变法时期,朝廷官员围绕变法形成支持和反对两派,即新党和旧党。在新党看来,苏轼是旧党的中坚人物,经常通过诗文对新法进行讥讽,这使新党欲除之而后快。但新党对苏轼的多次指控并未得到神宗的明确支持,因此只能在失望中继续搜寻更有力的“证据”。

机会终于来了!苏轼调任湖州后,依照惯例给朝廷上了一份《湖州谢上表》,以表达对皇上的感恩之意。苏轼如此写:“知其愚不适时,难以追陪新进;察其老不生事,或能牧养小民。”大意是:陛下知道我愚昧不堪,不合时宜,难以和变法派共事;又考察我年老不爱生事,在地方管理普通百姓或能勉强及格。这让新党的官员如获至宝。在他们看来,这分明是对新法、对皇上表达不满。加上以前搜罗的各种“证据”,苏轼被逮捕归

案,“乌台诗案”发生了。

在狱中,苏轼接受了一百多天的审讯。主审者翻阅了苏轼大量诗文并进行指控,认为他自始至终疯狂攻击新法。在连番审讯后,苏轼身心俱疲,只能选择认罪。认罪的后果当然很严重,那就是杀头!苏轼已有赴死的预期,甚至还偷偷储藏青金丹(主治胃病,含水银成分,过量服用会导致死亡)准备自杀。儿子苏迈坚持给狱中的父亲送饭,由于不能见面,父子俩约定,平常只送蔬菜和肉食,如果有死刑的消息,就改送鱼。有一天,苏迈外出有事,委托亲戚代为送饭。亲戚看到苏轼的饮食相对单调,于是改送了一条熏鱼。苏轼一见大惊失色,认为大限已到,便写下《狱中寄子由》的绝命诗,表达了“与君世世为兄弟,更结人间未了因”的手足之情,读之让人动容。

苏轼被捕入狱的消息在朝野上下引起极大轰动,一方面是新党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,另一方面很多人想尽办法营救他,甚至还惊动了太皇太后。最终,苏轼“死罪可免,活罪难逃”,朝廷以“讥讽政事”的名义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在黄州的五年,苏轼躬身劳作、布衣蔬食,同时佳作频出,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均在这一时期诞生。一个新的苏轼站立在大众面前……

是颓废还是超越?

因诗案被贬黄州是苏轼一生的重要转折点。面对飞来横祸,是就此颓废还是勇敢超越?这是摆在苏轼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。初到黄州时,他常常整天闭门不出,昏昏欲睡。在与朋友交往中也是战战兢兢,多次在书信中叮嘱友人“不须示人”“看讫,火之”,唯恐“好事者巧以酝酿,便生出无穷事也”,可谓是有心有余悸。

但苏轼之所以是苏轼,就因为他能在逆境中完成自我救赎,然后潇洒地活下去,并将自己的人生体悟融入文学创作中,达到新高度。

过了一段时间,苏轼在黄州进行自我反省的同时,开始寻找生活的乐趣,他一方

面广交朋友,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,另一方面和家人开荒种地,并自号“东坡居士”,最终慢慢从困境中走出,心境上也从先前的“西北望,射天狼”的壮志豪情转变为“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”的潇洒自在。

经历了“乌台诗案”和被贬黄州,这份精神境界上的超然此后一直伴随着苏轼,即便后来再次被贬惠州、儋州,他也能心平气和地活下去、写下去。在惠州,他写下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,“报道先生春睡美,道人轻打五更钟”。在海南,他深情告白:“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元宵夜,他还和几位老书生逛街、进寺庙、穿小巷,随时随地发现快乐、享受快乐。如此通透,才是那个我们熟悉的东坡。

一桩诗案

乌台霜尽海空阔

文本刊特约撰稿 曾庆江

苏轼的不变

文本刊特约撰稿 曾庆江

应该说,苏轼不算一个成功的政治家。他担任过礼部尚书等职,但时间大多不长,他一生中多次被贬谪,仕途颇为曲折。但是,苏轼又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,因为他不轻易更改自己的主张,永葆为政初心。

纵观苏轼的履历,不难发现:无论职务高低,他在每个地方为官,都能做到勤政为民。在徐州任知州时,黄河决口致徐州城被洪水围困,不少富人出城躲避洪水,民心动摇。苏轼耐心劝说大家回城,并带领官兵和百姓共同努力,最终守住了徐州城。在杭州任上时,当地遭遇饥荒和瘟疫,苏轼一边请求朝廷减免部分赋税,一边想方设法赈灾,让百姓顺利渡过难关。他出任登州知州仅五日即被召还京城,尽管只做了短短五日的登州地方长官,也作出了让百姓称颂的业绩。他给朝廷上书《乞罢登莱榷盐状》,陈述榷盐专卖制的利弊得失,建议最终被采纳,为百姓带来了实惠。

即便是在花甲之年被贬海南儋州,他依然心里装着地方发展和百姓福祉。海南相对落后的教育状况激发了苏轼的使命感,桃榔庵成为他敷施教文的重要场所,姜唐佐、符确等人在他的倾心指导下,学问有了很大长进,先后考中举人和进士。

苏轼永葆为政初心,还体现在始终以客观事实为依据、以百姓利益为根本,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,不盲从,不见风使舵。新党掌权时,他对变法急于求成的做法提出批评,遭人憎恨,连连被贬。旧党掌权后,将所有的新法措施废止,拼命打压新党人士,苏轼也予以抨击,从而又遭到旧党的攻击。苏轼既不能容于新党,也不能容于旧党,这使得他长期受到排挤,先后被贬黄州、惠州、儋州,然而这正是他以客观事实为依据、以百姓利益为根本的体现。

山东蓬莱(古登州)的东坡雕像。本版手绘杨千懿

